

# 人类学视野中的难侨经济适应机制探究

## ——以云南省甘庄苗族难侨为例\*<sup>1</sup>

郑宇<sup>1</sup>，胡梦蝶<sup>2</sup>

(1.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2. 泸州外国语学校，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甘庄苗族难侨较为成功的发展经历表明，他们的经济适应机制是以制度供给为前提、以资源支撑为基础、以族群主体性为核心共同构成的。三者之间的耦合方式与程度，决定了难侨经济生活的适应水平。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特定语境中，它们通过相互嵌合、抵牾、改造等多样互动方式，赋予经济适应机制相应的阶段性持续调适的动态特征。

**【关键词】**：苗族；难侨；农场；经济适应机制；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D81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8)02-0019-08

关于东南亚苗族经济变迁的代表性研究，如格迪斯对泰国白苗鸦片经济与生态文化改变之间关系的分析；<sup>①</sup>从当地人自身出发，《发展政策对白苗社会经济的影响》为泰国苗族人的经济适应提供了“反转视角”<sup>②</sup>。而关于华侨农场经济发展的国内研究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历史角度出发，概括性地总结华侨农场的发展转型困境，如归纳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历史根源、资源匮乏、制度约束，以及全民所有制农业企业的特殊建制等。<sup>③</sup>二是从个案出发揭示现实存在问题。如有研究指出，由于集中安置、统一管理政策的影响，使难侨常常面临生计方式重新选择的困境；<sup>④</sup>滇越边境难民村Y村，苗族难民长期面临着土地资源稀缺与人口增长的矛盾难题等。<sup>⑤</sup>三是关于华侨农场的发展对策探讨，涉及经济管理政策转型、城镇化、旅游业发展等多个方向。<sup>⑥</sup>

---

1\* **【作者简介】** 郑宇，男，四川荣经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人类学与跨境苗族问题研究。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协作组织的经济功能转型与提升研究”（16XJA850001）；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项目“云南甘庄华侨农场越南难侨的经济生活转型调查研究”（15BZQK111）阶段性成果。

2①Geddes, William R. Opium and the Miao: A Study in Ecological Adjustment [J]. Oceania, 1970, 1(1~11).

②Lee, Gary Yia. Effects of Development Measures on the Socio-economy of the White Hmong [D]. University of Sydney, 1981.

③梁姣, 等. 广西华侨农场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探究 [J]. 八桂侨刊, 2005, (5).

④郑一省. 广西华侨农林场、归难侨安置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实验室” [J]. 八桂侨刊, 2012, (2).

⑤王越平. 生计选择与社会建构——滇越边境难民村的个案 [A].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C].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

也许是我国华侨农场大都存在发展困境的现实，使得既有成果绝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困境的描述，以及形成原因的归纳。但由于缺乏人类学视角和方法，因此关于经济发展难题及其应对的认知，大多受限于政策措施改进以及市场化推进两大维度。难侨的经济适应机制通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由政策所决定的，被动的、单一的、只是形式差异但实质同一的演进过程；评估适应的指标，也基本只限于经济增长数据。在对云南甘庄苗族难侨约 50 天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置身新的国家及其生存环境中的难民的经济适应关联着错综复杂的因素，其经济适应机制是由作为前提的制度供给、作为基础的资源支撑，和作为核心的族群主体性三大要素共同构成。这一机制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揭示当代世界各难民群体的经济适应过程的普遍性特征；而且通过弥合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方法，还可能推动演化制度经济学、人类学“嵌入”学说等代表性经济变迁理论之间的交流发展。

## 一、安置初期的艰难适应与适应机制初构

我国的 84 个华侨农场，由于较长时期的政策性、社会性负担，特别是西部地区资源条件受限，总体发展较为滞后。其中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的甘庄华侨农场，一方面具有与其他农场相似的波折发展历程，另一方面，甘庄华侨农场的越南苗族难侨相对成功的经济转型经历较为罕见，因此能够为其他农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难侨族群的未来发展提供经验借鉴。而对其适应机制的阐释，还能促进我们关于当前越来越频繁的跨国流动群体经济适应过程的认知。

从 1983 年到 1985 年，国营甘庄华侨农场开始陆续接收马关县境内的难民。<sup>①</sup>据估算，当时甘庄农场先后共安置苗族难民 800 多人。他们来自越南老街省、河江省等地，以自称 HmongbShib, Hmongb-Buak 支系为主。

在苗族难民到达甘庄之初，其经济适应机制便随即启动。他们首先遭遇了适应机制中的两大构成要素——资源支撑与族群主体性之间的激烈冲突所导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

其一，作为各类资源先决条件的生态环境差异的挑战。甘庄地处两个小盆地构成的干热河谷地带，气候潮湿炎热。直至清末，仍有《宝秀道中》诗曰“此去元江多瘴疠，行人只逐犹西奔”，可见该区域瘴气之严重。而这种气候环境与东南亚苗族长期生活的、凉爽湿润的高海拔山地气候几乎完全相左。苗族人因为气候不适应，缺乏应对经验和常识，大人小孩上吐下泻的现象时有发生，受蚊虫、蚂蟥叮咬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农场职工医院甚至因此一度出现人手不够、药品短缺等现象。从“赞米亚”高地族群到低地族群的突变，<sup>②</sup>对其族群主体性所造成的强烈冲击，囊括了个体的身体、心理以及族群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从而形成了他们对于当地各类资源的认知、利用的直接障碍。

其二，作为资源运用主导方式的生计方式急剧转型的挑战。越南苗族传统上主要采用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等粗放式方式，对于劳动力的投入要求很低。然而来到甘庄后，他们必须适应在炎热干燥的低地河谷劳动，此外还要掌握甘蔗种植的复杂技术，包括切种子、播种、种植、培育、喷洒农药、锄地、灌溉、剪枝和装载甘蔗等，致力于通过密集劳动力投入获取更高收益。加之最晚到来的他们只能安置在坝区边缘，如干坝岔路口、东山脚、茶山等区域。这些区域土壤层薄，肥力欠缺，涵养水源能力差。贫瘠的土地进一步加大了耕作难度。作为资源运用主导方式的生计方式的质变，以及劳动力投入强度、难度的骤然提升，使得习惯了“低度”生产的他们极难适应。<sup>③</sup>

其三，作为资源拓展必要条件的社会支撑匮乏的挑战。甘庄农场内有不同时期到达的多种民族，包括世居的傣族、彝族，

---

⑥许金顶，等. 厦门竹坝华侨农场体改及转型对策探析 [J]. 华侨大学学报, 2011, (1); 黄世棉. 广西华侨农场城镇化发展路径探讨 [J]. 黑龙江史志, 2010, (9); 陈成栋. 福建省华侨农场旅游业发展策略研究 [J]. 闽江学院学报, 2015, (6).

3①因越南的“排华”政策与对越自卫反击战产生的苗族难侨，历经了散布于边境各村寨的跨境亲属家中，到边境地区集中的难民营，再到集中安置甘庄的波折历程。

②詹姆士·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M]. 王晓毅，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6：297.

③马歇尔·萨林斯. 石器时代经济学 [M]. 张经纬，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9：49.

20 世纪 60 年代安置的印尼归侨，以及最后陆续来到的不同民族的越南难侨。55 岁的傣族刀大妈指出，他们小时候和印尼归侨一起学习、生活、合作劳动，而和苗族等几乎没有来往。因为初期的族际疏离，孤立的苗族难侨与其他族群之间缺乏必要的生产生活互助，资源的获取只能局限于政府救助范围，难以实现资源拓展。

面对资源支撑的重重困难挑战，制度供给及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安置初期，政府提供了一系列较为全面、细致的安置政策：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开展接侨工作；超过当时的政策标准，按每人 10 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 75 元的规格修建了接侨房屋；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和安抚工作；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工作机会等等。这些制度供给极大消解了资源支撑与族群主体性之间的激烈冲突，成为其适应机制初步构建的核心关键。

从苗族难侨经济适应机制的启动来看，他们的初期适应是被动的、消极的。从高海拔山地到低地河谷的环境突变、生计方式的转型，还有族际隔离造成的合作互助匮乏，导致了他们初期的适应障碍。少量苗族难侨甚至一度想要逃离农场，而当时的制度供给对化解这些矛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过程说明，虽然难民初期的适应机制首要取决于安置地与迁出地之间的资源支撑的相似度，但正如演化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学者诺思所提示的，充分的制度供给能够通过发挥激励作用，降低新的生存环境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削弱族群主体性的传统“路径依赖”影响，<sup>①</sup>从而极大缓解初期被迫适应所产生的强烈冲击。

## 二、计划经济时期二重性适应机制形成

1983 年至 1985 年期间，随着苗族难侨对低地环境及其生计方式的逐步适应，资源支撑问题的负面影响日益消退，适应机制本该开始进入族群主体性发挥作用的阶段。但是，因接待安置难侨的任务需要，此时的国营甘庄华侨农场仍然保留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肩负着思想政治和生产建设双重任务，生产资料、生活物资都由农场统一调配，难侨的生产生活也由农场统一安排。

强大的而单一的制度供给，使难侨的族群主体性被湮没。具体从甘庄来看，它由总部、分场、生产队组成，每个家庭都直接从属于生产队管理。在指令性计划生产下，农场将每年需要完成的计划细分到各分场，分场再具体安排生产队组织生产：如规定年满 18 岁的劳动力才具备职工身份，并且必须参与劳动。农场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必须达到出勤天数（男 220 天，女 200 天）才能获得工资。所有的资源配置都被纳入统一的制度体系中——不管是从事种植水稻，还是栽种甘蔗、照看牲畜等，全部成果都归集体所有，然后再统一分配。甚至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受到计划政策的严格管控。<sup>②</sup>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供给，在湮没、改造难侨族群主体性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二者之间的内在抵牾。这集中表现在经济合作组织模式方面。

作为苗族族群主体性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合作组织，建立在扩大家庭的基础之上，以父系血缘为基础形成的扩大家庭，一般涵盖三代人，通常容纳十余人到三四十人不等。从小孩到老人，凡是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都会按年龄、性别等自然分工进行劳动力配置。其中壮年男女负责土地开荒，以及种植玉米、番薯、黄豆等；青年男子是放牧与狩猎的主力；年老的妇女则承担了家务，尤其是纺织工作。即便是小孩也需要负责采集，并协助完成部分家务。一个家庭便是集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为一体的，经济要素“作为社会组织的功能”的整体单位。<sup>③</sup>它高度匹配于该族群高度游动、灵活且富有效率的游耕生计，从而呈现为经济与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合”，<sup>④</sup>并以此迥异于去家庭化的、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的计划经济组织模式。

当面临计划经济的强制改造时，曾经的扩大家庭只能将绝大部分经济功能交付生产队，同时自身也必须解体，细化为仅保留生活这一基本功能的核心家庭。而这一强制改造过程中附生的适应矛盾与抵牾，不仅表现在因劳动力配置方式变革而引发的

4①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等,2008:1,34,62.

②如一位难民谈道:“刚刚来的时候,全家刚刚有70块(工资)。后来没有了,因为我家是超生。83年、85年(计划生育)搞得太严重了。我因为85年生老三,(之后)全家就都不是职工了。”

③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3.

④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9~40.

不适应方面，如以拖沓、怠工、偷懒、欺骗、破坏等展现的“反抗的日常形式”；<sup>①</sup>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对相关联的婚丧嫁娶、“敬门猪”“喊魂”、祭祖等各类家庭仪式<sup>②</sup>被迫终止的愤懑不满中。显然，正式制度遭到了传统“非正式约束”制度或隐或现的对抗，<sup>③</sup>并因此支付了高额的制度成本。由此来看，该时期他们的适应仍是被动和消极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起甘庄其他族群，苗族难侨却又相对更快地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其原因同样植根于他们的族群主体性，尤其是扩大家庭的另一重要特点，即家庭内部所蕴藏的，高度的共同生产、平均分配、平均消费等“公有”经济特质之中。<sup>④</sup>这些特质主要包括共同合作开垦土地资源，共同享有水源与各类劳动工具，以及共同分配并消费劳动产品等。族群主体性因此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帮助他们较快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当然，与计划经济的根本差异在于，公有主体从扩大家庭改变为生产队，公有范围也从家庭内部被强制推广到了农场全体族群之中。

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以强大的迫力，在促使苗族难侨进一步适应农场经济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他们的族群主体性被湮没和部分改造。但与此同时，传统族群主体性也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即扩大家庭中公有因素与计划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内在契合，最终形成了二者的结合，从而赋予了该时期适应机制一种独特的、制度供给与族群主体性之间抵牾与嵌合兼具的二重性特点。

### 三、改制中的资源支撑拓展与适应机制质变

1985年之后，甘庄苗族难侨的适应机制开始发生质变。所谓的质变，是指难侨的适应态度从被动转变为主动、适应方式从单一转变为多元，以及适应机制中因为族群主体性的显著注入而产生了结构性演变。

适应机制的质变同样由制度供给启动。如果说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所实施的土地承包“所有制改革”，通过微观经济组织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获得经营自主权，由此产生自负盈亏等机制，并普遍促进了家庭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的话，<sup>⑤</sup>那么不同于这一常见路径，甘庄的苗族难侨在此时期所取得的发展成效，其核心动力则在于制度供给空隙中的族群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开荒获得大量土地资源支撑。

此次制度供给变革固然重要，但对苗族难侨族群主体性的直接影响却极其有限。从1984年开始，我国开始在农垦企业中推行场长责任制，试图通过强化场长权力来实现企业自主发展。甘庄农场从1985年开始，在农业、畜牧、基础建设、运输等行业中全面推行生产责任制。如在农业方面，实施了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脉相承的职工联产承包责任制。据苗族难侨LXY回忆：当时农场规定年满18岁的个人承包6亩地，才能取得职工身份；成为职工的第一年每月18元工资，第二年每月32元工资；至1988年，土地分到每家每户；甘蔗承包后，每亩交一吨甘蔗；此后不再给职工发放工资……改革成效显著，如农场的甘蔗产量从1979年的9847.683吨，增长到1986年的65447.076吨；苗族难侨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但是，激发他们生产积极性与族群主体性的核心动力却并非来自承包制本身。

究其实质，制度变革激励作用受限的原因，恰恰在于适应机制中的资源支撑的强力约束，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土地资源方面，由于苗族难侨最晚到达农场，安置区域内缺乏优渥的坝区水田或块地，导致他们承包的土地极为贫瘠。贫瘠而又有限的土地资源从根本上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二是在同样关键的劳动力资源方面，因为这场改革并不彻底，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从而极大约束了劳动力的自主经营。例如作物的选择，人们仍必须服从农场的统一安排，只能种植甘蔗。

①詹姆斯·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M]. 郑广怀，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5.

②郑宇，等. 仪式类型与社会边界——越南老街省孟康县坡龙乡坡龙街赫蒙族调查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7~28.

③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等，2008：50~63.

④郑宇. 中国少数民族生计方式转型与资源配置变迁[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1）.

⑤许经勇.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60年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63~64.

土地与劳动力资源的双重约束，加之作物的单一种植，造成了甘蔗种植边际效益递减效应，产量连年下滑。遇大旱之年，许多难侨家庭不仅无法上交承包所需的最低产量，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如据苗族难侨 ZL 回忆，1988 年他家 4 个劳动力承包了 30 亩土地，却只能收获两三百斤甘蔗。他们不得不开展各种副业，如敲石子、割山草、找“山货”（野生动物）等。但这些方式也仅够维持全家的基本生存而已。可见，正是由于土地与劳动力资源支撑的严重不足，使得此次制度供给对族群主体性的直接激励作用被极大削弱。

吊诡之处在于，这次体制改革族群主体性的促发，是通过一种意料之外的、间接的，甚至可以说是灰色的方式来实现的。具体而言，在难民身份制约与农场的严格管理中，当时苗族难侨解决生计困境并获得发展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拓展土地资源。而获得土地的合法途径，主要是承继从 1983 年开始的、陆续离开甘庄的少量印尼华侨的土地。而另一种更常见的办法则是“开荒”。“开荒”又分为两种，其一是少量的几户难侨向农场提出申请，并获得了正式批准；其二则是大部分难侨所采取的“偷偷开荒”的灰色“非法”方式。当然，后者能够实施的前提，正是当时体制改革的空隙，即在集体计划经济向承包制的转型过程中，对于农场大量存留的公有荒地，上层制度并未明确规范其实际的使用权属。

开垦公有荒地并行使实质的使用权，从而获得急需的大量土地资源支撑，加之制度空隙背景下农场管理者的默认态度，共同构成了激发苗族难侨族群主体性的外部动力。而相比甘庄其他族群，他们还具备来自族群主体性的强大的、深层的内部动力，即他们的开荒传统。传统上以刀耕火种为生的东南亚高地的苗族人，堪称专业的开荒群体。如他们曾创造的主要农业工具，大多都与开荒有直接关系：弯刀适宜砍草和砍灌木丛，括子便于在陡坡挖掘山地，苗犁、蝴蝶锄等有助于山地耕作……<sup>6①</sup>东南亚苗族因此被称为“森林里的农夫”。大部分的苗族难侨家庭，在该时期都开出了数亩至 20 亩不等的土地用于甘蔗种植。正是这一举措所拓展的资源支撑，造就了他们甘蔗产量的急速增长，以及比农场其他族群更快的经济生活水平提升的结果。

所以，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体制改革虽然同样达致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但甘庄苗族难侨的实现途径却与中国其他农村、其他农场的常见模式大相径庭。苗族难侨的族群主体性，是在土地、劳动力资源支撑匮乏的双重压力下，利用了当时制度对于公有荒地管控制度存在的空隙，并积极运用其开荒传统而获得空前激发。这一历程也表明，其适应机制已发生从消极适应向主动适应的质变；适应方式也从对资源或制度的单一依赖，转变为族群主体性与它们之间的、在矛盾运动中的逐步嵌合。

#### 四、市场化改革中的适应机制构建与演变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进入农场自主改革阶段后，在当地制度供给的支持、推动下，苗族难侨持续发挥族群主体性，进一步拓展土地资源，并彻底突破了前一阶段中的劳动力资源约束。这个过程首次实现了制度供给、资源支撑与族群主体性的高度耦合，从而将其经济适应机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族群主体性的强化，同样建立在农场自主改革的制度供给基础之上。1988 年，在全国各地农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冲突日益激化的背景下，甘庄华侨农场同样开启了全面的自主深化改革，包括彻底取消一切指令性计划，实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从行政管理向服务生产性质转变等。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投资木糖醇厂所导致的数百万元损失之后，农场经济几乎全面瘫痪。1995 年，在甘庄经营成功的商业精英 M 担任领导，随即制定了严苛的承包土地只能种植甘蔗，并且所有的甘蔗必须卖给农场糖厂的管理制度。农场还大力鼓励外地人来甘庄开垦荒地、种植甘蔗，并采取了为甘蔗地修路等措施。苗族难侨 ZYB 回忆道：“从 1995 年开始，场部告诉大家‘谁开荒，谁拥有’。如果没有钱开荒，农场还会借钱，种甘蔗收成后再交给农场（从中）扣掉”。农场管理者因此构建了一整套鼓励大规模开辟荒地、种植甘蔗的制度体系。

制度供给从默许转向公开支持，以在当地合法的方式鼓励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充分结合，这彻底激发了苗族难侨拓展土地资源的欲求，赋予他们更强烈的开荒动力。他们夜以继日地投入到了开荒和甘蔗生产之中，但面对充裕的待开发土地，现有劳动力资源约束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

6①陈友山. Van Hoa Hmong[M]. 河内：民族文化出版社，1996：33.

土地资源开发的合法化，同时也催生了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对此，苗族难侨采用了邀请外来人口帮工的方式。如苗族难侨 ZXP 所说，“当时我们请小工，有红河的哈尼族，一个小工一天的工价八块、十块，也有好些是请在文山的苗族亲戚。现在这个村子里好多亲戚都是那时候过来的……亲戚一起帮忙开荒，然后再平分（土地）”。从外来劳动力构成来看，其中约 63% 是他们边境一带的苗族亲属及难侨们。至今为止，依然有约 200 位当时的外来苗族人驻留甘庄。充沛的外来劳动力的涌入，当然同样依赖制度供给这一前提，但劳动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并且在规模上远超其他族群，却与苗族难侨族群主体性的发挥息息相关。

这首先源自苗族难侨“侨”的身份特点。每个苗族家庭在中越边境线一带，都拥有各自错综复杂的亲属与族群社会资源。如仅仅中越边境的文山州金厂镇草果湾自然村，因为甘庄亲戚的邀约，当时就有数十户家庭来到甘庄农场打工，其中的四五户至今依然还在甘庄生活。其次，苗族难侨还拥有其他大部分族群缺乏的，历史中形成的擅长团体合作的农业生产传统。如有学者发现，相对于瑶族人在刀耕火种过程中各自为政，传统上苗族人更擅长合作，他们通常共同开垦并平均分配土地。<sup>①</sup>因此，正是源自丰裕的跨境亲属与族群社会资源，以及团体合作传统这两个族群主体性特点的交相作用，才使得苗族难侨能够快速、大规模地实现对外来劳动力的强力吸纳。

在高速、大范围地整合土地与劳动力两大资源要素后，苗族难侨最终平均每户达到了约 20 亩的开荒规模，从而在短期内通过甘蔗种植面积快速扩大及其规模化效应，获得了经济收入的成倍增长。<sup>②</sup>这一过程清楚表明，在制度供给与资源支撑保障的基础上，族群主体性一旦被调动，便能够在经济适应机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特定语境中，它甚至能够能动地、创造性地实现各类资源支撑的整合，从而构建更为有利于自身的经济适应机制。至此，制度供给、资源支撑与族群主体性三大要素开始了深度的有机耦合。

族群主体性能够独立、充分地发挥作用，宣告了苗族难侨的经济适应机制基本构建完成。随即从 2000 年开始的，以云南省政府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全省华侨农（林）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通知为标志，经过约 10 年的落实，甘庄国营农场终于转变为国有企业，成了独立市场主体，并于 2011 年设立甘庄街道办事处。在此背景下，甘庄苗族难侨人口目前已经快速增长至约 2000 人、864 户，聚居于 4 个社区中的 6 个居民小组。

制度供给推动了全面市场化时代的到来，让难侨从职工变成场员，这意味着国家从制度层面保证难侨能够自由地参与市场经济。这一根本性变革，不仅为难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资源通过市场优化配置提供了合法保障，同时也将以往封闭于农场内部的资源支撑获取，拓展到了无限的市场之中。这一过程再次提升了苗族难侨的族群主体性，它与资源支撑、制度供给之间的耦合互动关系随之表现出新的方式和特点。

族群主体性与资源支撑相互耦合的日益深化，集中地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市场化优化配置。其中又以经济作物资源的自主选择，以及劳动力资源的跨境流动这两方面最具代表性。

在经济作物方面，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农场意志体现的甘蔗生产，从 2000 年后被苗族难侨普遍放弃。他们主动选择了经济效益更好的芒果、油桃、柑橘、桂圆等，其中又以芒果最具代表性。如 2012 年时，甘庄芒果的种植面积达到 34967 平方米，产值达到 2922.74 万元，<sup>③</sup>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4555 元。芒果种植目前已经成为当地支柱产业，迅速提升了人们的经济收入。如 2016 年，苗族难侨 ZGW 家共收获芒果 4.5 万千克左右，现金收入约 6.8 万元，比种植玉米等作物多收获近 4 万元。不仅如此，他们还探索出符合本地特点的“公司+农户”等多种合作社形式；一部分人尝试运用微信等新兴媒介来推销产品，并支持快递送达。

7①白鸟芳郎. 东南亚山地民族志[M]. 黄来钧译. 昆明: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 1980: 35.

②相比起甘庄的其他族群职业的多样化, 以及远不及苗族人对于开荒的大力投入, 该时期发展的最主要受益群体正是苗族难侨。农场、糖厂、苗族三者之间还因此形成了一种稳固的、相互依赖的“三角”关系。如据 1993 年农场的《印支难民登记表》记录, 此时甘庄分场、红新分场、干坝分场的 18 岁以上的苗族成年人 90% 以上都在从事甘蔗种植。

8①杨琴, 等. 云南省元江县甘庄街道农业产业化存在问题及发展建议[J]. 北京农业, 2013, (18)

---

芒果产业的迅速发展，因而通过拓展新的资源支撑方式，反过来迅速增添、强化了苗族难侨传统族群主体性中较为缺乏的，诸如发展意识、商贸能力、族际交往能力等新的要素。

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除了常见的国内打工之外，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境外务工。这类务工以女性居多，主要是通过苗族跨境亲戚或是熟人介绍到香港、台湾等地做帮佣。如红新社区 50 岁的苗族退休女职工 ZDX，2016 年时经嫁到香港的侄女介绍去做保姆，一个月工资为 5000 元人民币。显然，这类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依然建立在跨境亲属关系与族群认同的基础之上。这仍是他们独特的“侨”的传统族群主体性的发挥。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目前已经将其转化为一种社会资本意义的、跨区域的全新资源支撑。

苗族难侨的经济适应机制因此已日趋完善。族群主体性不断强化，与制度供给、资源支撑之间的耦合愈加深入，互动方式更为多样，互动频率也更为频繁。适应机制的良性运作，推动了他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适应机制将就此无障碍地迈向完善状态。

当制度供给力度的持续加强，资源支撑条件的加速整合，反而开始导致族群主体性中一些负面因素的出现。甘庄 2011 年至 2015 年的“十二五”规划中的建设“旅游型小城镇”，以及 2012 年落户红新社区的工业园区，在为甘庄提供更为丰富的制度供给与资源支撑的同时，也因为土地征用而给部分苗族难侨带来大量经济赔偿。如新侨苗族小组 83 户 261 人，只有三户的土地未被征用，有的家庭获得高达 180 万元的赔偿款。其他没有获得征地赔偿款的苗族难侨，因此产生了与前者明显的贫富分化。不仅如此，因为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即便在较为富裕的群体内部，也出现了比起周边族群突出很多的权力争夺、土地矛盾、家庭财产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负面因素导致曾经较为同一的族群主体性的内部分化和裂变。可以预料，这些分化和裂变，势必反过来诱发当地制度供给、资源支撑的部分质变，从而促发适应机制的震荡和调适，乃至三大要素之间新的矛盾冲突，并由此产生一些苗族难侨的新的不适应问题。

## 五、关于经济适应机制的讨论

甘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中国政府安置下的少数民族难侨群体经济生活的变迁历程。苗族难侨 30 多年的波折而高速的发展过程，清楚表明了经济适应绝非仅仅由政府政策所决定，更不会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范畴。通过综合借鉴运用演化制度经济学、人类学的经济与社会“嵌合”等理论学说，我们发现，促使他们经济适应的机制，是以制度供给为前提、以资源支撑为基础、以族群主体性为核心而共同构成的。

从他们的历次适应过程来看，由安置措施、救济与管理方式、发展手段等构成的制度供给，始终是适应机制启动的先决前提条件；由生态环境与生计方式、生产资料要素、族际互助关系等形成的资源支撑，是适应机制不可或缺的必要基础；而由价值观、生计方式、生产生活习性、合作组织方式等组成的族群主体性，则是表征和决定难侨适应程度的核心关键。三者之间的耦合方式与深度，最终决定了难侨的经济适应水平。

进而必须认识到，其中的任何一方均不能单一地决定其他因素，三者之间也不会自然演进至相互嵌合的三位一体状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特定语境中，它们是通过互有交合，同时也可能相互抵牾、矛盾或改造的多样方式彼此作用的。如从苗族难侨的经历来看，资源支撑常常在初期与族群主体性产生矛盾，并造成适应困难，但制度供给能够对此有效补足；过于单一、强大的制度供给，可能衍生湮没族群主体性、约束资源支撑的有效配置等问题；而当制度供给调整得当，资源支撑获得足够拓展时，族群主体性将得到最大化释放。而且，族群主体性中的传统因素的作用极为强大。在特定语境中，它甚至能够部分地整合甚至改造制度供给与资源支撑要素。当然，族群主体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反过来制约适应机制的转型升级。这样的波动历程与作用方式，赋予了经济适应机制阶段性持续调适的动态特征。